

西方传教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上海方言著作研究

1847—1950年的上海话

钱乃荣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

1847—1950 年的上海话

钱乃荣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钱乃荣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671-1274-2

I. ①西… II. ①钱… III. ①吴语-方言研究-上海
市 IV. ①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0101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黄晓彦 封面设计 施羲雯

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

钱乃荣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7 字数 499 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1274-2/H·292 定价: 60.00 元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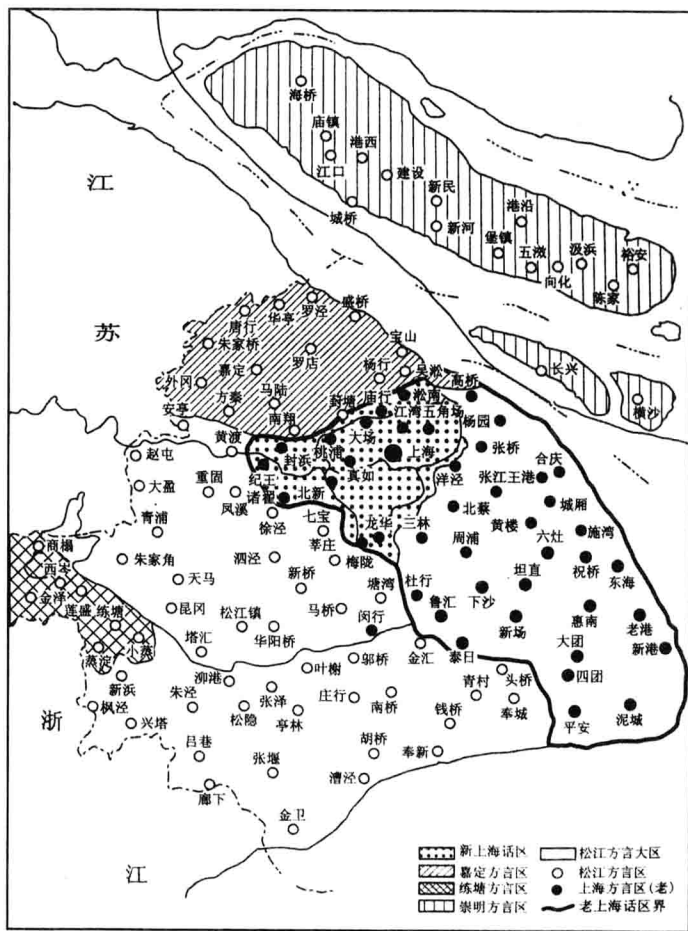
古代在长江出海的三角洲上，有一条自西向东、水势浩大的松江，后来改称吴淞江，就在现今的吴淞江（又称苏州河）的北面。在它下游将要入海之处，有两条支流，一条名叫上海浦，另一条称下海浦，上海浦后来就成了从龙华到外白渡桥的一段黄浦江。古代上海方言就是自从有了上海浦、有了上海人的聚居以后开始形成的。用“上海”称呼的人口聚落，有可靠证据的最早记录是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宋会要辑稿》上，这本书上写到在华亭县（后称松江县）的东北方，有一个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上海务”，这个地方大约在现在的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一侧，东面就是上海浦。这本书的记载距今已经有 936 年历史了。

语言区域的划分，是以语言特征作为划分标准的，它与行政区划是两回事，当然古代长期稳定的州府区划对语言的分合划界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在现今上海市的行政版图里，可以用语言的标志划分出几个方言区，上海方言区在现在上海市版图的东部黄浦江两岸，大致就在明清松江府原上海县的地域里。

在现今上海市管辖范围里，方言主要可以分两大块，古松江把长江三角洲分为淞南和淞北两块，淞北地域的语言统称嘉定方言区，这部分地区在清朝时属于太仓州管辖，与原苏州府的太仓、昆山语言相近；淞南一直到杭州湾长期属于松江府。到了南宋，松江上游开始淤塞，商船停泊上海浦，原来在松江上的华亭县的大港口青龙镇被上海务替代，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宋元之交，上海已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到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析华亭东北五乡置上海县时，上海已成为滨海大港，蕃商云集，县治仍在北宋的上海务处，上海浦即今黄浦江中段东西两岸已形成了一个巷陌纵横的人口聚居中心，户数达 6.4 万户，人口数十万人，一种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话就这样生成了，所以上海方言至少已有 720 多年的历史了。松江和上海后来一直是松江府的两大重镇，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在松江府里形成了西部的松江方言区和东部的上海方言区，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在开埠前，上海方言与松江方言十分相像，可统称松江方言大区，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近代上海开埠。上海县县城在 1843 年开埠前人口已有 12 万人，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 12，号称

“南吴壮县”，是内贸巨埠，“城东南隅，人烟稠密”。

现今上海市内的方言区还有包括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的崇明方言区，属吴江方言大区的练塘方言区，后者在清雍正二年(1724)后归吴江县、元和县、青浦县合辖，1910年才归松江府青浦县管辖。^①上海市内方言的分布详见下图。



上海地区方言分布图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Edkins)在 1853 年著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里，记到上海

^① 参见于祝鹏 1989:《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熊月之、周武 2007:《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吴德兴:《大买卖，上海开埠 170 年对外经贸运行轨迹》，2013 年 11 月 19 日《东方早报》。

方言和西面的松江方言有一个阳平声调的重要差别,西面是降调,东面是平调。在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敏先生对老上海方言区用不同于松江方言区的读低平调22的阳平声调(松江方言区是低降调31),把说上海话的地域北部与嘉定方言区、西部与松江方言区的边界划出来了,在以下的这些镇乡说的是上海方言,包括如今的嘉定区的吴淞江北岸的封浜(地名都包括镇乡),普陀区的长征、桃浦、真如,闵行区的纪王、诸翟、华漕、新泾、梅陇、虹桥、曹行、陈行、杜行、鲁汇,徐汇区的龙华、漕河泾,长宁区的新泾、程家桥,宝山区蕴藻浜以南的淞南、大场、庙行和葑塘(即祁连)东部,虹口区的江湾,杨浦区五角场。^①

在此前,8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市南市区黄家路调查70多岁的世居老年人,记录了80年代时的上海方言老派音系,还记录过在上海当时由黄浦区管辖的浦东地区的浦东音系,南汇惠南镇音系,又在奉贤泰日镇、四团镇、平安镇和头桥乡的北部,都记到了第一字为22阳平声调的两字组词语(如:媒人、蹄膀、长城、铜铃)的连读变调,读作23+44舒长调(当年在郊区乡下或者沪剧老唱片中可以听得比较明显);^②石汝杰在1985年发表的《川沙音系》中也记到川沙镇上的这个连调,在离川沙城厢镇不远的施湾、六团都还记到城厢镇已与其他声调合并了的阳平22单字调。连读变调一般都比单字调合并较迟,保留更老的语音。^③我曾将上海城区80年代的老派音系连读变调和1986年石汝杰记录的川沙城厢镇音系连读变调作了比较,十分相近。^④这样,划入上海方言区的地域还要包括90年代的上海市城区,浦东的川沙和南汇两县地区,和奉贤县的四团、平安、泰日北部和头桥北部。于是就把说上海方言的地域范围划分出来了。

综上所述,在淞南,除了练塘方言区外,就是一个松江方言大区,其中包括西部的松江方言区和东部的上海方言区。黄浦江东部的上海地域自元代起长期为上海县管辖,直到清雍正年间,川沙厅和南汇县才从上海县析出,所以直到上海开埠时,黄浦江两岸的方言还是大致相同的。由于上海县更近海滩,上海方言原来比松江方言变化更缓慢,如中古咸山摄字在西面的松江方言里早已消失了鼻音,但在东面的上海方言里还残留轻微的鼻音,这种鼻音我80年代在浦东还调查到。

以涵盖语音频率最高的声调特征来划分,现今上海市版图内的方言分区见

① 陈忠敏 1992: 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② 可参见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中笔者撰写的上海市区老派方言音系和连读变调、浦东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钱乃荣 1994:《上海市郊一县语音变异的考察——奉贤语音的内部差异》中所记的奉贤方言同言线和南汇惠南方言连读变调。

③ 石汝杰 1985:《川沙音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④ 钱乃荣 2003:《上海语言发展史》中所记的上海南市区老派连读变调和川沙镇连读变调的比较。

下表:

方 言 区		调 类 数	阴 声 调				阳 声 调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全清	次清						
太仓大区	崇明区	8	53	435		44	5	13	31	213	2
	嘉定区	7	53	435		44	5	31	213		2
松江大区	上海区	8	53	44		35	5	22	213	13	2
	松江区	8	53	44		35	5	31	22	13	2
吴江大区	练塘区	9	53	51	44	35	4	31	22	13	2

由于历史上上海方言变化缓慢,英国传教士艾约瑟 1853 年在上海县城调查记录的上海话,还与松江话十分接近。在此之前的清嘉庆初年,上海县城里的才子张南庄用上海话口语夹杂白话书面语写了一本章回小说《何典》,其中的大量上海话语词在开埠时还流行在上海县城,有的还记在法国传教士 Rebouin 1894 年著的《法华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词典》里,甚至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保留在整个松江方言大区的农村中。直到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在城区还没有扩展到达或刚到达的镇乡,还可以在老年人中调查到缓慢变化的老上海话。

在距今 170 年前,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开埠,1845 年 11 月设立了英租界,1849 年 4 月设立了法租界,1862 年英租界又与美租界合并改为公共租界。在租界和原县城、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很快形成了繁华城区,上海迅速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区里的上海话也随上海的都市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自 20 世纪 10 年代起就已成为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地成为江南和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城区上海话一跃成为吴语中发展最快的方言。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提倡“大众语”的乐嗣炳(1935)写到了上海当时语言生活的崭新面貌:“中国的现阶段是产业革命。上海港每年出入船舶二万多只三千多吨,在世界只让纽约。……充实的物质文化发展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近几十年来主要的文化运动和文化人大都从上海出发。……随着时代而演进,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心点,同时是新中国语顶大的制造厂;一件新的事物在上海发现,上海人立刻替它制造一批新的语词,大批的翻译,大量的书报每天播送着新语词,……最先流通在上海……,它汇集了全人类语言的精华,是代表大众的思潮的,它一面不断生产,一面散布各方。”^①

① 乐嗣炳 1935: 大众语决不是国语,《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广益书局。

我这本书所研究的是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100年间留下的上海方言文献,而这100年正好是上海走向全球化上海方言在城区发生最大变化的100年,所以这个研究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在这个100年中,城区里的老上海话快速变成了新上海方言,四周的人却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大致说着艾约瑟所记的老上海话,甚至说新上海话的城区青年走到乡下去,语言隔膜到居然听不懂乡下老年妇女说话的地步。新的上海城区方言由于上海城市的地位,被中外都称为上海话,并且一跃成为全国三大方言(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之一。而城区上海话没有到达的说老上海方言的广大地区,后来被民间称为说的是“上海本地话”,或分别以乡镇命名方言,如三林塘话、江湾话、梅陇话等。城区的上海方言从老上海话过渡到新上海话最快的时期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正好西方传教士在这时期留下了不少上海话著作,如蒲君南1939年、1941年所记的上海方言词语、句子表达方式、语法,就与1910年戴维斯所记的上海方言有较大的差别,与艾约瑟1853年所记更有很大差别。

本书是我对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100年间留下的上海方言文献进行的语言学研究。

我自1962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9月中旬偶尔在复旦图书馆借到了一本赵元任先生的语言学经典著作《现代吴语的研究》起,就爱上了方言的研究,当时就把赵先生书中上海方言的语音“旧、新”派音系等做了详细的笔记。后来我又翻阅了高本汉著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中的上海话与中古音的对照表,进一步养成了我对语言学的兴趣。我对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的大量翻阅、抄录、搜集,做研究,开始于我考进复旦大学现代汉语研究生的1978年。寻觅发现和积累这些著作,伴随了我读研究生和以后在大学里教学的长期生涯,一边搜集一边就开始进行研究。

上海在1843年11月开埠,现在能见到的西方传教士写的上海话文本,最早的《祷告文式》31页,是1844年留下的;麦都思在1847年出版了上海土白的第一部《约翰书》。到如今,我已经收集到在上海开埠后至1950年西方传教士所著的上海方言著作40余本,包括原版本、复印本、PDF文件本,此外还收集到这个时期日本学者、中国学者出版的一些上海方言著作。

我在本书研究中用到的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共40本。此外,有日本学者出版的上海方言著作12本;上海学者出版的上海话著作有5本;其他语言学著作中包含上海方言内容的著作有2本;可与《土语指南》做对照本用的官话著作一本。具体书目见研究书目。

我写这本书,在很必要时,也会引用到上面所列的日本学者著作中和语言学家

高本汉、赵元任著作中的例句或其记载的语音。

1844年清廷才解除了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禁例,到1855年才给予基督教到内地传教的权利。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50年,传教士编写的上海方言著作连续未间断地出版了100年,为我们记载了100年里上海话的真实面貌。我在本书中所做的研究,应该是无一字没来历的、有根有据地对上海方言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在阅读传教士对上海方言的虔诚记录里,我可以脚踏实地地发现、探讨回答上海语音、语法结构的几乎全部问题,并能看到正好是上海这个大都市从起步到繁华发展最快的100年中上海话的变化。

我研究传教士著作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86年1月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由王士元主持召开的“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题目是《The Chang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后来刊载于《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期刊的“Monograph Series Number 3”中。在这篇论文中我翻译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所记的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不久的上海方言音系,并以在各地的实际田野调查记录,说明了这个还与20世纪80年代松江、奉贤方言十分相似的音系在今上海市的版图上100年间发生的变化情形,由近及远展开的共时分布与上海城市中心语音的历时演进过程是一致的。从此时起,我就陆续有一些研究上海方言和吴语专题的论文发表,其中运用了不少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中的语料以及他们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在2003年,我的一本30万字的《上海语言发展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语言学专家朱晓农教授发表文章评价我这本书,其开头的几句是这样写的:“历来的方言研究著作,大多是平面的描写,很少有作历史探讨的。即使有,也不是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齐头并进,即使某一个方面也不过零星难成系统,没有一本能像本书那样,可信地重建历经150年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的方言史。”“现有的历史语言学著作,大多是推理与猜测齐飞,证据与花枪共舞,很少有历时变化的重建基于如此密实的材料,即使有,也达不到本书几臻‘无一字无来历’的境界。这不是贬低历史语言学家的成就,而是说两者的工作性质有所不同。一个是根据历史比较法,根据方块字的非语言学记载去构拟消逝了的古音;一个是根据用字母写就的为语言学,或至少是为学语言而写的本行业的资料。”^①

就是因为有了传教士对上海方言的详细的真实记录,才使得我能进行这样的具体研究。我受到朱晓农先生那些话的鼓舞,于是决心进一步地大量采集资料,对语料条分缕析,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认识到的理论方法,再下更为缜密的功夫,写成一本希望是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起名为《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

① 朱晓农、朱琳:评钱乃荣新著《上海语言发展史》,《汉语学报》2005年第4期。

究》。这本书的提纲在前几年有幸得到了语言学评审专家的首肯,列入了“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项目,获得了研究资助。2013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提出申请,本书又获得了上海文化基金会2013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的资助出版。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我是研究我的母语上海话的,写好这本书我责无旁贷。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我长时期研究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的一个小结。在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进行语言学的解读中,我着重研究和展示的,是从传教士著作中所见的上海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结构规律,从传教士著作中所见的上海方言的历时变化。传教士100年间的上海话有的词语和语音虽然已经在新上海话中消逝,好在绝大多数都还保留在上海郊区乡村,要鉴别哪本著作写得好不好,尽可到现今上海本地话中去对照。幸亏我在20世纪70年代有8年在上海奉贤县生活和教书的经历,这使我对已经在新上海话中消逝的那些词语和表达形式有着亲身耳闻以至交际中使用的经验记忆,因而对传教士书中的那些词语和语法现象感到十分亲切,反应准确,这大大有利于做好这个项目,所以我非常感激有这一段的人生经历。

在这本书里,我进一步运用世界语言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继续以传教士著作中的上海方言为基础,加上自己所说的上海话中的体会,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如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上海方言中的“SOV”语序层次,以及在向“SVO”语序转变同时后置词形式向前置词的变化情形,在对老上海话观察中寻找上海方言的多种时态,寻找一些语助词的语法化的路径,分析上海方言中的一隅虚拟句的语法特点等。这些新的理论探索未必一定正确,但是还是提出来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

在2012年,我和田佳佳一起翻译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68年著《上海方言口语语法》中文本,好不容易由北京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我也和大家一起庆贺西方传教士的上海话著作中文译作首次问世。

由于传教士著作在寻觅搜集上难度较大,研究传教士上海话著作已发表的专著和论文不多。游汝杰先生2002年《西方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是一本全面地介绍西方传教士的方言记录和研究著作书目的重要参考书。已发表的论文有:周同春1988年《十九世纪的上海语音》,内田庆市1995年《〈沪语指南〉的若干语助词》,石汝杰1994年《19世纪上海音系和相关的问题》,游汝杰1998年《西洋传教士著作所见上海话的塞音韵尾》,石汝杰2005年《EDKINS〈上海方言语法〉同音字表》,石汝杰、王一萍2011年《〈土话指南〉中的入声》,林素娥2011年《百年前上海话的几个句法特征——基于〈官话指南〉和〈土话指南〉的对比考察》,2013年《一百多年来吴语四种“顺行结构”的演变》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我的研究都有很大

启发,尤其是林素娥女士已经发表的多篇论文。

由于传教士方言著作在国内的图书馆中收藏寥若晨星,一些收藏的地方不准复印、扫描或拍照,因此绝大多数的著作都是本人在美国、日本、法国、中国香港等地的国家、都市、大学图书馆中觅得并复印,收集资料伴随着我的半生岁月。从20世纪70年代研究吴方言开始至今,遇到在海外廿多次出席国际语言学会议或教学、讲学、进行合作研究等各种机会场合,几十年来一直在寻觅这些书。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帮助我获得资料的导师、朋友和同事,美国的杨福绵教授、王士元教授、沈钟伟教授,日本的官田一郎教授、波多野太郎教授、内田庆市教授、古屋昭弘教授、太田斋教授等,我的同学游汝杰教授、石汝杰教授等,都将他们亲自去各地图书馆复印的或珍本送给我,或借给我复印。关西大学的内田庆市教授得到1847年“慕姑娘”的手写本《油拉八国》讲义后,亲自来上海送给我复印本。当我到荷兰莱顿大学去参加国际会议时,一名热爱上海话的网友朱晔毅先生特地从法国南部把在里昂市图书馆购买的1950年在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法国传教士蒲君南《法华新词典(上海方言)》PDF文件,路远迢迢地送到我下榻的巴黎的旅馆里来,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徐锦华先生设法帮助我寻觅到复印1894年《法华上海方言松江方言词典》的地方。我也买到好多本原版著作。这里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同学、复旦大学游汝杰教授给我复印了不少他珍藏的传教士著作,他曾利用各次到国外去开会、交流的机会走访各地图书馆发现和珍藏了大量的传教士中国方言著作复印本。在此我还要感谢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支持。如今我努力写好我这本新书,也是对帮助和支持我的同行者和图书馆最好的报答。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中引用传教士著作的上海方言语句很多,因节省篇幅缘故,不可能对每个例句都用普通话注释,只能对少数特别需要说明的例句在句后的括号里注出引用书名和页数之后用普通话译出。引用传教士著作的原文,用字一概按照原文,不作改动。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我又搜集了大量清末民国的老唱片。我想,从能发出当年上海方言声音的沪剧、上海滑稽的老唱片中,也许可以研究更为真实的上海方言面貌及其变化史。

我谨以本书纪念上海开埠170周年。

钱乃荣

记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畔听雨阁

2013年11月17日

目 录

第一章 主要的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评述	1
第二章 上海方言的语音	37
第一节 上海开埠后 50 年中的三个上海方言音系	37
第二节 1900 年上海方言同音字表	43
第三节 1853—1992 年 15 个音系变化对照	65
第三章 从 19 世纪上海方言著作中看五项音变的词汇扩散	78
第四章 上海方言的语序	91
第五章 上海方言的话题句和受事前置句	116
第一节 话题句	116
第二节 受事前置句	125
第三节 句型统计	131
第六章 上海方言中的前后置词	134
第一节 “SOV”优势语序的语言与用后置词带修饰成分相和谐	134
第二节 上海方言中的后置介词	135
第三节 上海方言中的前置介词	148
第四节 上海方言中的后置连词和前置连词	153
第七章 上海方言的“垃”和“垃”字结构	167
第八章 上海方言的时态	178
第一节 上海方言的现在完成时态	178
第二节 上海方言中的五种时态及其变迁	180
第三节 非时态句中所见的各种“体”形态	196
第九章 上海方言的语助词	208
第一节 提顿助词	208
第二节 连接助词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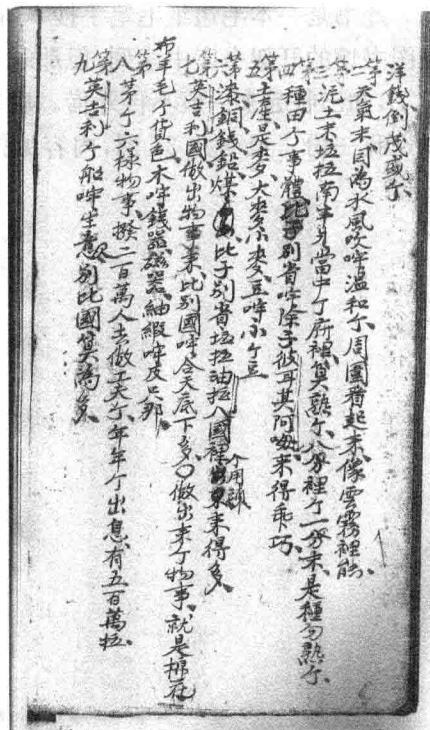
第三节 体助词	223
第四节 语气助词	235
第十章 上海方言的指代词、量词、助动词、时间词、副词	254
第一节 指代词	254
第二节 量词	285
第三节 助动词	294
第四节 时间词	303
第五节 副词	307
第十一章 上海方言的授受类双及物结构形式	333
第十二章 上海方言中的疑问句、否定句、比较句、“拨”字句和“拿”字句	341
第一节 疑问句	341
第二节 否定句	347
第三节 比较句	351
第四节 “拨”字句	354
第五节 “拿”字句	356
第十三章 上海方言中的虚拟句	359
第十四章 上海方言词语的新陈代谢	378
第一节 上海方言土著基本词的淘汰更换	378
第二节 语汇变迁统计	392
第十五章 上海话语料举例	397
参考文献	411

第一章 主要的传教士上海 方言著作评述

在前言后,我已经将我要讨论到的西方传教士上海方言著作清单列出,共有40本。在这些书中我选择了22本比较重要的书,按年代次序排列,在此加以概要的评述。

一、1849年慕姑娘《油拉八国》(英)

此书是一本手抄本,用毛笔直行书写,字迹秀丽,共95页。留名“慕姑娘”,疑系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家属。1847年8月,慕维廉到上海先协助麦都思传道,1860年与艾约瑟一起去北方,到蒙古地区活动,回沪后任伦敦会牧师,1900年逝世于上海。他生前著有30多种传教小册子,还译述《地理全志》、《大英国志》等历史、地理类著作多种。此书只在第一页上用钢笔横写“July 10, 1849”日期,那时慕维廉在上海。此书是一部历史地理讲义手稿,语句多处有修改,分两部分,“油拉八国”只是第一部分的标题,即“欧洲(欧罗巴国)”;第二部分是“爱息阿国”,即“亚洲(亚细亚国)”。全书从英吉利开头一直写到夏威夷结尾,介绍世界各个国家地方包括各个海岛地方的地理、历史和风貌、宗教,包括“大清国”,具体写到经度纬度,对各地民俗了解相当深入,语句相当活泼自然,是考察19世纪上海方言的极好资料。“第块”、“垃拉”、“拉墟”、“拨伊”、“常庄”、“户荡”、“事体”、“北半片”、“里向”、“壁立直个”等方言字的写法在此时都已经很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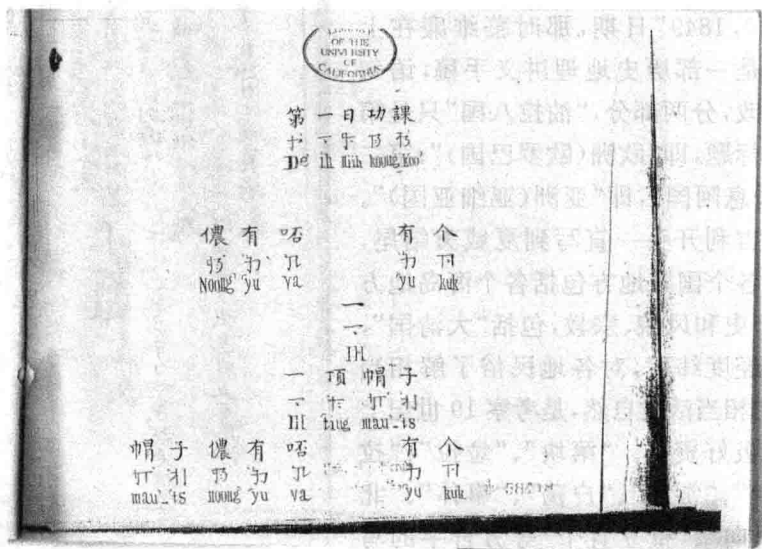


1849年慕姑娘《油拉八国》手写本正文

由于这是一本讲稿、手抄本,也有不少涂改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到较多较早的口语面貌和真实信息。比如在 30 页上的名词句:“亚爱伦个南半只,买物事个地方,呀是粮草生意,聚集个户荡。停船户荡末,算好个。”又比如 31 页上,有这样一句话:“带百个传教先生打英吉利哋、亚美利迦出来个,现在要试试看,叫哋拉相信个好道理末,倒带样印底庵个土白拉。”此句话中,前置介词“从”,当年用“打”,这个“打”字还是作者改上去的,可见“打”是早年的上海话中比“从”更常用的起始介词,与艾约瑟在《上海方言口语语法》书中所记相同。第三人称单数“哋拉”比后来用的“伊拉”、“其拉”更古老。上句中最后的“拉”,在他的书中常见于说明文字的句尾,说明在当年常用虚化的“语助词‘拉’”表示“在那儿”的存在、现状语气。“打英吉利哋、亚美利迦出来个”是“带百个传教先生”的后置定语,也是至今上海话中常见的一种表达句式,这在以后的一些传教士较“正规”的书中反而少见。这本讲义的句子很短,完全符合上海话的特点,是很顺畅的口语记录。

二、1850 年 Benjarmin Jenkins《上海土白》(英)

此书是一本毛边纸毛笔手抄本,在笔者 1985 年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的开架书库中读到,但那时不能复印,后来又两次去美国到那里,该书不见了,知已收起来一般不再外借。后来游汝杰教授在 1997 年才复印到手,再复印赠送我一份。全书共 31 课,内容编排很完整,每课题书“第一日功课”这样依次。



1850 年《上海土白》手写本正文

每一日功课安排比较自由,有时是先以一两句话开头,再列词语,再围绕一两个主题学句子;有的是分几块内容,先学短语,再以短语为纲组织对话句子,通常用问答式。同型语句反复列举换词,浅显易学,比较实用。全书每个词语和每个句子,都是三行一排:第一行汉字;第二行是汉字笔画型的方块拼音符号,带声调符号,疑是本土人当年自制的标音形式;第三行是罗马字母拼音,也在辅音的上角划半圈标示声调,左上角为上声,右上角为去声,平声不标,入声由韵尾 h 显示。上海话用字很规范,可见上海方言在当年民间已有相当标准的约定文字。如“第个(这个)”、“箇个(那个)”、“个(的)”、“担(拿)”、“呒没(没有)”、“场化、户荡(地方)”、“墟头(那儿)”、“脱(和)”、“多化(许多)”、“呢啥(还是不)”、“秃(都)”、“垃拉(在、正在)”、“拉(在、正在、在那儿)”、“拉哩(在这儿)”。此书中,可以见到刚开埠不久的最老的海话词语、语法、语音形式。如“拉哩”为近指的“在这儿”,定指起头用“箇个”:“箇个事体依做脱末? 做脱个者。”(P. 482)由于是口语问答,故有不少 SOV 句和拷贝式的话题句,如:“伊字识唔?”“伊晓末晓得个认末勿认得。”

三、1853 年 James Summers《用罗马字母表示的上海方言》(英)

封面的书名,就已说明了这本书的主旨:用罗马拉丁字母字体书写的,表现在中国语言上海方言中的约翰圣徒的福音,附有导言和词汇表。出版于伦敦。

作者认为,上海方言有 10 个元音音位,它们是: /i:/、/ei:/、/a:/、/aw:/、/ou:/、/u:/、/y:/、/ø:/、/Λ:/、/ɿ/;这 10 个元音的读音,该书是这样描写: i 如 feet 中的 ee, e 如 lay 中的 ay, a 如 ah 中的 a, 下加点的 o 如 law 中的 aw, o 如 no 中的 o, u 如 root 中的 oo, ü 如法语中 l'une 中的 u, ö 如法语中 soeur 中的 oeu, 下加一点的 a 如 gun 中的 u 或 cur 中的 ur, 另有 tsz、dz 中的 ɿ。这是对 150 年前上海话元音音位的最概括性的归纳。辅音音位有 24 个,它们是: /p:/、/b:/、/m:/、/f:/、/v:/、/t:/、/d:/、/n:/、/l:/、/k:/、/g:/、/ŋ:/、/h:/、/tʃ:/、/dʒ:/、/ç:/、/ʒ:/、/ts:/、/dz:/、/s:/、/z:/、/r:/、/w:/、/j/。

这些音位中, /Λ/ 包含 [Λ]、[ə:] 两个变体。他认为上海话中有 tsz、sz (是)、ssz (世)、dz、ts 这样的连续辅音,即有包含有 z[ɿ] 的复合辅音,这是因为当时未有舌尖元音一说。他说明 /r/ 是在元音 [ə:] 后发音,如同法语 [er] 中的 [r]; “ŋ” 在元音后发音,如同法语的 bon 中的 on [bɔ̃] 中的 “n”, 即发鼻化音,而在音节开头为 [ŋ]。/n/ 包含 [n]、[n̥] 两个变体。作者还在实际记音中区分了各套送气与不送气清辅音,如 t、t'。他记录了上海方言的 8 个声调,分为高调系列(发音高)和低调系列(发音低),即现今认为的阴调系列和阳调系列。他对 8 个声调的描述涉及在连读中的调值比较细致,都是正确的,如他说高调类的第一个声调读如英语 “yes”、“no” 那样的发音(即降调),该声调在使用中(在连读语音词中或单用后接语音词,即所谓的“广

用式”或“窄用式”里——笔者注)读音没有起落(即为平调);第二个声调是升高调(即阴去调——笔者注);第三个声调大致与第一声雷同(即阴上调,是平调——笔者注);第四个声调发音变短,刚出即断(即阴入调——笔者注)。他说低调类中,第一个声调基本上是保持声调平稳,没有什么变调,只是调子定低一点(即低平调);第二个声调很像苏格兰的自然口音,具体很难描写;第三个声调为疑问句调子,像“eh?”等(即阳上的先平后升调——笔者注);第四个声调类似高调中的短促调,发音时就像被突然吞下去一样,其结尾就像英语中“t”、“k”的发音(即低促调——笔者注)。这位传教士对19世纪中叶上海发音的音系记录和分析是基本正确的,尤其是他认为上海方言中的后鼻音韵实际上都是如法语中鼻化音,认识与以后别人的分析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如“ŋ”在“o”后的韵母,现今平悦铃女士用语音仪做出的实验结果,也是一个鼻化音。^①在19世纪中叶,语言学系统的音位理论尚未提出,但作者对上海方言的元音和辅音的分析实际上已经使用了音位归纳法。

此书对各词类都作了简要的举例,动词说到上海方言的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祈使语气、可能式的表达法,认为“个哉”表示过去时,“末哉”表示现在时等,虽说得并不很妥当,但不无启发意义。书中列举了人称代词、指示词、数词和常用的语助词和介词(包括后置介词)、连词。

接着第二大部分便是用上海话罗马字音标分词书写的共94页的圣约翰语录,标题是“约翰神好新闻”,共22章,是最早的罗马字母拼音的上海方言“约翰书”之一。最后附录的是第一、二章的中英式词汇表。

四、1862年麦高温《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英)

麦高温(John Macgowan),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35年出生于英国港口城市Belfast,1858年成为英国伦敦苏格兰教会成员,1859年在伦敦英国长老会学院学习,同年8月24日被按立为牧师,10月21日从英国起程前往中国,次年3月23日抵达上海,承担部分教务工作。1862年创办《中外杂志》,并出版了这本《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1863年,麦高温加入厦门伦敦会工作,1883年出版《英汉厦门方言词典》。他还出版多种中国民俗学、历史学著作。

这本书共有193页,除开头列出上海方言的音系标音字母说明外,共分48节编写。每一节有一个专题,先列出所用的词语,加以解释;接着列举自然的常用语句,一句一句分列编排,并不连贯,注音并译成英文。

这本书记录了19世纪中期上海方言口语的常用词语和语法形式,涉及当年生

^① 平悦铃 2005:《上海方言语音动态腭位研究》,香港文汇出版社。